

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

郭湛波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

郭湛波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

郭湛波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政编码:2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胶南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875印张 2插页 200千字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7-209-02038-1
B·108 定价:17.50元

总 序

在世纪之交的特殊时刻,人们更加热烈地展望、描绘未来,同时也以复杂的心情回顾、反思着过去。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发展道路,便是这种回顾、反思中的重要课题。应该说,这种回顾、反思不仅仅属于过去,而且联结着未来——联结着中国的21世纪。

人们要确切地了解一个时代思想学术的精神实际,首要在明了它的社会背景,换句话说,先得吃透这个时代的各种社会矛盾,兼及主要矛盾双方的特点,以及它们在具体社会实践中错综复杂的交互影响,尤其在不断前进中体现的客观发展规律。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同样也离不开这一点。

大家知道,旧中国是贫弱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是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对象,虽还多少不同于当时仅是某一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过去,孙中山先生曾称之为“次殖民地”,那是很恰当的。但中国又是一个广土众民、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即是存在辉煌过去的大国,只是由于长期的闭关自守、政治腐败,乃至影响经济文化等的相对停滞不前,从而大大地落后了。同时由于思想学术没有实现近代化,没能大力发展实验科学的研究,导致综合国力不强,这样,就自然形成了一种

FI 12 12607

只有挨打的局面。于是西方各种思想，乘虚而入，也就是毫无选择地被介绍进中国来，难免令人眼花缭乱。由于当时人们对自己、外境还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并不真实地了解本国的国情，加之我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又演进得非常快，在思想界便产生了“盲目排外”、“崇洋媚外”等偏向，以致影响到，即使是立场坚定的爱国志士，一时也有未能跟上时代前进、确切知道什么是眼前中国真正需要的，……。历史在曲折中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代表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劳动人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这就使得旧封建势力与大资产阶级的各代表自然结成了联合阵线，一致从事抵抗这种新思想，尽管他们各人的动机并不完全相同，面目也不一样；同时也有一些要求进步的学者、思想家，当时限于个人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仅从书本上了解到一点马克思主义，由于脱离具体革命实践，自然体会浅有深，一般说来，不可能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这就形成了1949年前非解放区思想学术界的五花八门。但在现实矛盾的发展中，又在酝酿着新的突破。

就与中国传统思想关系而言，思想家、学者们由于接受过去思想文化影响的不同，便有了标榜复兴儒、佛、道学说乃至墨、法……各家的差异。在学风上，有一部分人，喜欢迎合一些外来的新学术，于是，传统的中国学术思想，也有被披上一层外来资产阶级学术的外衣加以传播的。这同样是这个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学术思想的一个特点。自然，其中也有从事比较深入研究而得出的成果，但也有多半出乎牵强比附、乃至臆造完全缺乏科学精神的，要融合东西文化，而且恰到好处，短时间是行不通的。

我们认为要比较全面而深刻地了解本世纪思想学术的全貌，选取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代表作，经过认真的整理（包括校

注),有计划地出版,是一项有必要的工作。所选著作中有的是当时的名著,其它也都有一定影响、可供研究者参考的。我们这样说,自然并不意味着,这些著作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已经得出科学的结论。我们相信读者的批判鉴别力。

严格讲来,不具有高水平的理论修养,兼及工作上实事求是的精神,未经过刻苦的钻研,是很难在短期内写出有价值的学术思想专著。不是真正了解东西方思想文化本来面目和历史发展的,也很难融会贯通而成功地做出有创造性的新贡献。脚踏实地的从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新思想,就得不断结合实践,时时进步,时时创造,以期熔铸古今中外文化精华于一体。这套《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的出版,无疑会从一个侧面开拓人们的视野,使不致割断历史,考虑问题更加全面而细致,对提高我国现代思想学术的研究水平,必将有所助益。

是为序。

石 峻

1996年9月25日于北京

重版引言

任何转型与重建的时代都必然是思想文化汹涌澎湃、异彩纷呈的时代。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乃至 30 年代的中国社会，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剧烈的社会震荡。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动摇了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基础，打破了传统的中国中心观念。帝制的崩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破产，“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鸦片战争以来就困扰着人们的问题进一步凸现出来。改良还是革命？往西走还是往东去？“近五十年来，中国思想变动之剧烈，派别之复杂，较之春秋战国只有增加而无逊色。”事实上，中国社会思想的变迁折射着中华民族面对外来挑战、重构自己生存方式、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艰难历程。

出于对民族危机与苦难的不同感受以及对东、西文化的不同理解，人们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是截然不同的，在思想史上表现为不同社会思潮的分歧与争鸣，其中尤以保守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三派之间的争锋最为激烈。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可以说是以这三大派别为主的社会思潮相互冲突、此消彼长的过程，形成了纵横交错、错综复杂的思想格局。郭湛波先生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给我们展现的就是那个社会思潮的波澜壮阔、群星璀璨的文化狂飚时代。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是郭湛波先生继《辩证法研究》、《先秦辩学史》、《伦理学十六讲》之后的又一著作，成书于1934年，原名为《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1935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发行。后经作者修改，增加了部分章节后于1936年以现名再版。全书共分八篇，分别叙述了近50年中国思想的演变、思想论战、新思想之介绍以及国故整理与批评等内容，其中关于50年思想的演变可以说是全书中最重要、最精彩的部分。作者从社会经济组织的变动决定思想变更出发，把近50年思想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1)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农业宗法封建社会的思想；(2)从民国成立到“北伐成功”，以反传统为特征的代表工业资本社会的思想；(3)从“北伐成功”到30年代，代表工业资本社会自身矛盾所产生的社会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流行为特征。这种划分在今天看来表述未必准确，但的确为我们勾勒出近50年中国思想演变的基本行程。

一、改良主义思潮

改良主义是近50年中国思想史第一阶段的主要思潮，它的产生是中国思想界对西方文明挑战的最初回应。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直接表现为军事和经济的侵略，“器物”的落后首先成为人们痛心疾首的问题，因而“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早期改良派的最初目标。当时人们以为，只要取西人器数之学就可“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试图“变器卫道”，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19世纪后半叶广为流传的社会思潮。

洋务运动的失败，宣告了早期改良派思想的破产。康有为、

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意识到,仅仅依靠“器物”层的变革还不足以挽救国家危亡之命运,因而依据进化论的思想对洋务派“道不变”的思想进行批判,提出了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主张,试图以此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康有为率先托古改制,把公羊“三世”说与《礼记·礼运》中讲的大同、小康联系起来,认为社会发展是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太平世”的进化过程,指出“据乱世尚君主,升平世尚君民共主,太平世尚民主”,把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看作是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明确提出“世”不同则“道”不同的变革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变法维新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主张。谭嗣同则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反动腐朽的封建纲常名教和君主专制,直指孔子的权威。在他看来,“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苟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由此发出要“冲决网罗”的呐喊。梁启超则自称为“新思想界之陈涉”,主张用“破坏主义”来摧毁两千年封建统治和孔教独尊。在梁启超看来,中国欲革新图强就必须有“新民”,“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要培养“新民”,首先必须从培养“新民德”入手,必须实行“道德革命”,摒弃中国传统的“只知有私德而不知有公德”的落后状况,摒弃“让而不争”的弱者道德,要求建设“国家思想”,培养国民的“冒险精神”,希望通过理想国民的培养,通过道德革命达到建立理想国家的目标。

从“变器卫道”到变法维新,标志着中国思想界已由“器”而“道”,已开始从制度、文化层面反思中国的传统与文化。然而,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资产阶级改良派始终未能“冲决网罗”,面对

着日益高涨的反封建浪潮,最终蜕变为保皇派,退回到“中体西用”的老路上去,成为中国思想文化阵营中的保守主义势力。

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积淀在民族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封建糟粕并没有被彻底涤荡。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丑剧的上演,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尊古复古的逆流。这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传统伦理纲常是封建统制的思想根基,也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障碍。此外,随着西方思想的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唯意志论、生命哲学等大规模涌入中国,通过东西文化的比较,人们对中国社会落后挨打的深层原因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重估。因而近50年思想史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一方面是要“破坏中国农业社会旧有思想”,一方面是“输入西洋工业资本社会之新思想”,表现为传统与反传统的激烈冲突,形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吴敬恒等为首的知识分子,高举着“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批判。陈独秀在列举了东、西文化之五种差异后指出,东洋民族具有“卑劣无耻之根性”,作为东洋文化代表的孔子之道不能用来组织国家社会,而应“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李大钊也指出,东洋文明主“静”,而西洋文明主“动”,主张中国应全部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动”的文明对“静”的文明进行彻底扫荡,表现出对西方科学与民主的强烈

憧憬与向往。胡适则以为，西方文明是“利用厚生”的不知足、进取、承认物质享受的文明；东方文明则是“知足”、“保守”、“乐天安命”、“无知”、“顺帝之则”、“安贫守己”的文明。因此，中国不只物质机械不如人，一切政治道德、知识、文学、艺术……都不如人，主张“很热烈地颂扬西洋近代文明”，主张“往西走”，采纳西方议会民主制，走以英美为楷模的社会发展道路，成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突出代表。

应该说，新文化运动对东、西差异之剖析、对传统之批判是切中要害的，然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东、西差异归结为时代差异，把中、西冲突归结为新、旧冲突，出现了像吴敬恒那样要把“国学”丢到毛厕里的激进人物，相信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要求对传统进行全盘否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出于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忧虑，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少数知识分子竭力维护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反对把文化的民族差异完全归结为时代差异，主张“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要“批评地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认为“我们在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我们在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的路”；坚持走中国自己的路，即所谓“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一条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的特殊发展道路。梁漱溟先生也由此成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言人和现代新儒学的创始人。继其后的熊十力、冯友兰等都基本上遵循着这条原则，向往着一条东方式的社会发展道路。直至70年代，这条道路被当代新儒家明确称为“儒家资本主义”。

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则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由激进的自

由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中国应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中国思想史上自由主义西化派、新儒家的文化保守派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三派之间相互争锋的格局基本形成。这一期间所进行的“文体论战”、“东西文化论战”、“科玄论战”等基本上都在这三大阵营之间展开。中国思想史这一阶段如郭湛波先生所指出的:“是反对孔子的学说思想及一切旧的传统风俗、习惯、礼教、伦理,拥护科学及西洋文明,建设新的人生,思想,是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最重要,最有光彩的一段。”

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中国自一九二七年社会科学风起云涌,辩证唯物论思想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当时介绍唯物辩证法的著作、译著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在大学讲坛都占据了一定的地盘,以至于嘴里不讲几句辩证法或唯物论都不一定受学生欢迎。连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张东荪先生也承认,“无论赞成与反对,而唯物辩证法闯入哲学界总可以说是一个事实。”

马克思主义在30年代的广泛传播既取决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在“五四”时期,对早期传播贡献最大、最有代表性的当首推李大钊与陈独秀。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侧重于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他强调阶级斗争在社会组织的改造和变动中的作用,认为阶级斗争乃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还力图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分析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陈独秀也对“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等思想进行了不遗余力的介绍,并在与张东荪、梁启超关

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中,较为全面系统地阐发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认为“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现实斗争需要密切结合起来,反对社会改良,反对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坚持中国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近50年中国思想史第三阶段“新思想的种子”,主要就是由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人种下的。

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非但没有销声匿迹,新思想的火种反而以燎原之势在青年一代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理解和支持。这一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巨大贡献的是共产党人李达。李达不仅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还写下了被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社会学大纲》,首次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30年代唯物辩证法作为一种代表先进思想潮流的方法在思想学术领域被广泛地应用着,并日益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

在30年代进行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以及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争论中,参加论战的各派,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都无一例外地使用着马克思的社会阶段划分理论及其范畴体系。关于中国社会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的争论则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前途和目标。共产党的“新思潮派”关于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最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为当时正在进行的土地革命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走十月革命的路,到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已由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并日益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在中国革命中开始

发挥越来越大的指导作用。

我们深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文化其中国化的过程必将是漫长和曲折的,这也是近 50 年中国思想史乃至当代思想文化领域始终存在着中、西、马之争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我们重新回顾近 50 年思想行程意义之所在。

当然,郭湛波先生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其一,对思想时代背景分析过于简单,无法更深入地说明思想产生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其二,对思想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描述不够明确,表现在人物的选择、思想内容的叙述上难免详略不当或前后重复,显得结构不够严谨;其三,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不够准确,对思想属性的分析带有激进主义的色彩,有时对保守派的评价未免有失公正。就总体而言,《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基本上如实、客观地再现了中国社会崩溃与重建时期的思想轮廓,在我们即将跨入 21 世纪,在新一轮文化争论重新掀起之际,再版此书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我们坚信,“新的时代,终会到来”,中华民族必将崛起于 21 世纪。

本书原著为竖排繁体字本,这次重印改为横排简体字。校注时对原著中明显错讹之处作了改正。书中个别字词、标点(如通假字、异体字、得、地、的等)用法与现在不同,一般不作改动,以保持历史原貌。

赵丽霞

1996 年 10 月

《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编委会

主 编	石 峻
编 委	刘德久
	尹 铭
	张利民
	宋志明
	陈志良
	胡伟希
	高瑞泉

目 录

再版自序·····	1
第一篇 导 言·····	8
第二篇 五十年来中国思想之演变(上) ·····	11
(一)康有为 ·····	11
康有为之生平及著述——康有为之时代及思想之渊源——康有为之变法维新与孔子之托古改制——《春秋公羊》之“三统”“三世”与《礼运》之“小康”“大同”——康有为对于中国历史及社会的解答——康有为的《大同书》及“大同”学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及其对于经学之解答——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及对于中国思想界之影响——康有为在思想史之矛盾发展——康有为之尊孔读经——结论	
(二)谭嗣同 ·····	20
谭嗣同之生平及著述——中国资本社会启蒙思想家与康梁之异点——谭嗣同之根本思想——“仁学”——谭氏对于本体之认识——“以太”——谭氏对于辩证法则——“万物流转”的认识——谭氏的宇宙观——谭氏的知识论——谭氏对于辩证法则——“对立统一”之又一认识——谭氏的政治思想——谭氏对于中国历史之总评——谭氏对于封建社会“名教”之攻击	

——谭氏对于封建社会道德——“淫”“俭”之见解——谭氏之“民主”及排满思想——谭氏对于孔子学说之卫护

(三)梁启超 33

梁氏之生平及著述——梁氏思想与康氏之异点——梁氏对于康氏“孔教”之反对及思想自由之主张——梁氏“新民”的学说及思想——“新民”之方法——新道德及思想的建立——“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与“自治”——“进步”与“破坏”——梁氏对于“科学”之排斥——梁氏对于中国文化及思想之尊崇——梁氏对于“宗教”之拥护——梁氏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之贡献及地位

(四)严 复 47

近五十年思想史第一阶段思潮之派别——严氏略传——严氏之译述——严氏译述标准——严氏译述对于思想界之影响——严氏所译之《天演论》——严氏对于西洋思想之误解——严氏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之价值——严氏之尊孔读经——严氏对于新道德之反抗——严氏对于语体文之蔑视——结论

(五)章炳麟 54

章氏之生平及著述——章氏之种族革命思想及来源——章氏在近代学术史上的贡献——章氏在思想史上之矛盾进展——章氏在近代思想史上的贡献——章氏对于“国故”之保护——章氏对于“今文家”及甲骨文之反对——结论

(六)王国维 58

王氏之生平及著述——王氏对于西洋哲学之介绍——王氏对于中国哲学之见解——王氏对于元曲之贡献及批评——王氏龟甲甲骨文之整理及其对思想上之影响——王氏在近代思想史上之矛盾发展——王氏对于中西思想之态度——王氏思想之